

神圣与俗常

阿占



《后海》 阿占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人们围绕着他
诗歌应当被围绕
灯的背面。阿占在喝鲜榨橙汁
和一个猛子扎进海里的王小鱼一样,她不相信黑
她说榨橙汁的男孩像大卫。大卫甩着长发腼腆地笑
他不用作《弓歌》,也不需要攻占耶路撒冷
谷子需要奔跑。娶妻,生子,奔丧
时间,和谷子的奔跑一样,慢慢跑丢了
只剩一九五零
那是个怎样的时代
怎样的符号
我不能指认,小说还未结束
但我们彼此确信,它比半米以外
正用顿挫的语调接受采访的老西川更近
更近的是《后海》。二零二三的前奏
我们不能失去它
每个人都在苦苦找寻文字。我们把橙汁一饮而尽

至今我都认为这是为数不多的令人着迷的时刻。坐在那里聊《后海》,周遭很欢动,我们没有回头,更没有停下,因为我们好像正漂泊在大海上,漫无目的前进,不知道去往何方,任由文学摆渡,一脸的神圣与俗常。这种感觉太好了。以至于,究竟与伊聊了些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

当然,我必是犹疑且坚定地说出了《后海》脉络。我应该说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海滩涂极浩,沃沃野野,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工人阶级冯家,共有五子,与大哥二哥一样,老三谷子在滩涂上疯长,眼前波涛堆叠,身后则是灰色的工业剪影。谷子在厂区之间度过了游走的少年时代,后顶替母亲在纺织厂就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传统工业势颓,铁饭碗不保了,谷子停薪留职去闯荡,与人合伙在前海经营快艇生意,救下因失恋跳海自杀的文青叶简兮,去杭城“决斗”叶的负心男友赵既白,直至做了叶家上门女婿,又引出一番生死离别……谷子的故事延续一甲子,另有数条副线,多重人物穿插,企图构建一部后海当代风情录。多年后谷子回到了出生地,后海面目全非,曾经的纺织厂已变博物馆,曾经的滩涂上建起了动车站。谷子一边赞叹时代进程,一边感喟回不去的城愁。这座城的回忆、当下和未来,都浸在海水味道里,咸涩或鲜亮。

我应该还说过——不,不仅仅是这样的,“后海”的“后”,“前海”的“前”,暗合着被界定的空间性与内蕴的时间性,我妄想展现人物生存位移的过程中,敞开一条通往未来的精神秘径。做不到是一回事。想不想做,是另一回事。若能借日常之力的开掘,实现文本中历史经验的功能与意义确认,得以管窥海洋文化之内在命线,就算没有白写吧?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地点,良友书坊,也可称为青岛国际诗歌节分现场。我与霞忠欣博士聊起《后海》。过了半月,这个纷繁如电影转场一般的片段,被伊写成了诗——

那日午后。我们忘记世界
忘记世界里的我们
只有那个被赋名谷子的男人,永不停歇
下午三点钟。一束光打在老西川脸上
他的头发不似十年前凌乱
同样白



施坚雅的中国乡村“六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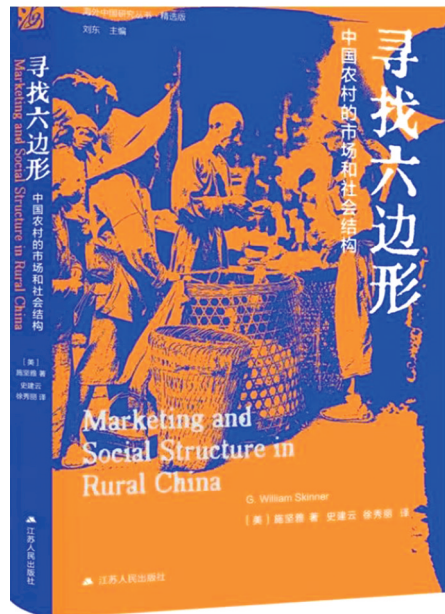
王翔宇

麦收已罢,又是一个丰收年。看网络自媒体,不断有关于乡村的视频,丰收的景象,令人百感交集。如今的麦忙季节,不再是镰刀霍霍,弯腰垄亩,基本上已经实现现代化了。这倒让我想起施坚雅的所谓中国乡村的“六边形”来了。

多少年前,因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而知道了施坚雅这一名字,他的所谓巨区理论在当时即引起强烈关注。时至今日,我们经常看到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等说法,当然还有东部、中部、西部一些城市群的提法,不能不说多多少少有点施坚雅的影子。而就城市研究,还有一位刘易斯·芒福德,他的一部《城市发展史》也是影响了不少人。施坚雅不仅研究中国的城市问题,也研究中国的农村,大致在1998年,他出版了一部不足十五万字的关于中国农村的书,此即《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恕我直言,初读此书,虽然有点云里雾里,还是备受震撼:这个美国学者虽然是依据成都平原一隅的乡村治理提出“六边形”理论,放置于全中国,有点削足适履,但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由三篇论文所构成。第一部分是说“市场和中心地”,他辨析村庄、小市、么店、集镇、中心集镇之间的区别,探讨集镇集市的周期性和集期,论述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提出他的密集循环基础之上的六边形和18村庄理论,他因而得出大胆的结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领域中,那么这个领域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进而更明确地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所称的基层市场区域又称之为中间集镇,在这一社会范围之内,有官吏,也有乡绅与有领导地位的商人指导决定着这一地域内的事务裁决。施坚雅征引莫顿·弗里德就安徽滁县的描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有成就的地主、商人、手艺人 and 官吏常常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交往。富裕的地主结交富裕的商人而不是贫穷的地主;有成就的手艺人宁可与富裕商人做伴,而不理睬贫困的同行。……各个行会的首领通常由镇上的一个绅士担任,联合行会的首领也同样。”施坚雅说,任何一种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只要它把与相关联的市场体系进行比较作为重点,就必然会随着层次的提高越来越注意到行政体系。他强调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

施坚雅在论述中国乡村传统的变化与现代的变革中,已经不再拘泥于成都平原,他以宁波的鄞县、广东、山东等地为例,说明铁路的出现、现代工业制度的冲击,中国的乡村结构也在发生微妙的嬗变,“在农村现代化的全过程中,自20世纪初开始,约有5300个传统的基层市场——城郊的和农村的——衰亡,它们的所在地不再是经济中心地”,“当共产党于



《寻找六边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美]施坚雅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1949年底实现了对整个大陆的解放时,按照上述估计,在中国农耕区域广袤的乡村里,仍有约5.8万个基层市场体系。”施坚雅特别注意到,甚至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建立了两种新的机构,一是国营贸易公司,二是供销合作社,准备通过它们逐渐使农村贸易社会主义化。完全属于国家并由政府商业部门所管理的贸易公司一般设立在城市和中心集镇。每家公司均有其经营专项,例如谷物、食用油、海产品、文化用品,为了买卖的需要,还在附近集镇设立了分公司。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国营贸易公司和私人商号之间通行自由竞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国营公司开始获得重要商品官方垄断权的1953年11月。到1954年底,国营公司已经合并了许多大的私营商行,控制了批发市场的大部分。施坚雅通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市场的分析,还有市场社区与农村人民公社的认真比较后认为,公社与市场体系并未达成完美结合既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现在,人们普遍把集体化单位和自然系统明确地联系起来。一位在1963年参观过几个人民公社的英国经济学家从她的中国主人那里得知,“小队、大队和公社的系统已被嫁接在农村生活的古老根基之上”。这样,对集体化也好,对市场也好,人们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传统结构,不得不在它们呆滞的力量之上进行建设,不得不通过它们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努力。如果传统的中国村庄因此而以生产大队的形式被相对完整地地带入现代世界,那么,基层市场社区却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它的持续性。因为,在传统的市场社区限定了农村改革所选择的手段的同时,农村改革又不可避免地非常确实地反过来赋予它们以新的形式。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施坚雅的研究仅限于中国大陆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没有把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此后的更大幅度的改革开放纳入其研究视野,也没有注意到1980年之后人民公社在中国大陆的逐步废除。施坚雅的研究提到了陶铸、吴芝圃等人,足见他研读有关文献的功夫之深。

施坚雅去世在2008年,享年83岁。